

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齐先生也谈到“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若干新的学派。新学派为了贯彻它们对于历史的看法,就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史料来源”。并举年鉴学派、经济社会史和人口史的例子加以说明,因而得出结论“现代史学扩充史料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①。同时史料的日益丰富又需要理论指导来加以利用分析“搜集史料……做到全面又谈何容易。史家为免于灭顶之灾的自救之方就有赖于理论的提高和方法的改进。”^②无论是包含了历史认知的史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史料本身出发,都能够推导出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理论的出现,能够指导新的研究领域。而要对新的史料进行利用,也需要在历史认知上有新的创新,这反过来也促进了理论的创新。例如齐世荣先生在谈到史料优劣的一些分析,就已经具有了拓展一些新的问题与领域的雏形。例如谈到回忆录中钱基博的例子,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过往多强调政府对于知识分子的从

上而下的作用,知识分子本身处于一种逆来顺受的位置。但是从钱基博的视野而言,齐先生利用回忆录论及他在这场运动中的特殊性,我看杨绛的一些文章就提到了钱基博在运动中的积极性,而钱钟书则采取了另外的态度,联系到钱基博的家学渊源以及钱钟书的留学经历,这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多角度具有延续性的观察标本,为史料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各种立场与态度的切入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齐世荣先生的这本书一方面本意是希望通过对新史料的分析与辨析,能规范和提高史学工作者在处理史料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对于史料的探讨中,特别是对于新的史料的分析中引领或导出新的研究问题与领域,培养创新的历史认知意识,促进史学的发展,从中我们也可想见老先生的学术深蕴以及苦心孤诣。

(责任编辑:仲平)

①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 34 页。

②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 35 页。

博览善择 举重明轻

——读齐世荣先生著《史料五讲》的几点启示

朱露川

“史料”问题是中国史学家长期关注的问题,学界已出版一些专著讨论史料的整理和运用。2014 年 6 月,齐世荣先生新著《史料五讲》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专

讲史料问题的五篇论文,另附两篇涉及史料问题的专论,反映了作者在史料学领域研究的心得和创获。研读此书,深感它对于我们后学拓展史料学视野,进一步掌握运用史料的方法和分寸,进而

收稿日期:2014-10-19

作者简介:朱露川,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窥探齐世荣先生的史学思想,都有很多启示。今将笔者研读此书的几点认识,发表出来,请学术界前辈指正。

一、怎样看待“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是《史料五讲》再三致意的见解,因此,本书从多方面阐述这一核心思想。^①

作者首先辨析了史料的种类,全书开篇着重论述了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两种文字史料各自的优劣,作者通过分析历史上学者们关于官、私史料价值的不同观点,强调“官书与私记并重,新史料与旧史料兼采”^②。其余四篇详细讨论了在过去或被夸大、或被忽略的四种私记史料,包括日记、私人信函、回忆录类私人文件、小说。

作者进而明确指出史料、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史料、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是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可分别论述,但不可奉其一为至尊。”^③在史学方法上,作者提倡向马克思主义学习,使“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达到高度的统一”。^④作者多次强调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环节,但他同时指出“史料学不等于史学”^⑤,因此不支持“史料至上”的观点。

——关于史料的搜集,作者提出了两项原则,即“扩张”和“详尽”。关于扩张,他认为“搜集材料应力求全面”,“史料以后还会继续扩充,也必须继续扩充。因为人类社会在发展,发展中必然产生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就必须搜集与新问题有关的新资料”^⑥。在跟中青年学者漫谈学风问题时,他也强调“利用新史料”是学术创新的重要途径。^⑦关于详尽,作者指出“‘竭泽而渔’是搜集

资料的最高标准。”^⑧在谈到有关档案的工作时,齐先生认为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工作是“互相依存”的,档案工作者应当与史学工作者“密切合作”,其中非常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出版史料汇编”^⑨。

——史料的运用是作者非常重视的问题。他举陈垣、陈寅恪之例,指出他们两人使用史料的原则和具体办法是“官书与私记并重、兼采,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用所当用。”^⑩作者不仅重视总结前人运用史料的经验,而且在自身的史学研究中熟练地运用史料。在《史料五讲》一书中,作者旁征博引,所征引史料种类繁多,内容贯通古今、兼顾中西,包含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的史料。齐世荣先生非常鼓励中国的外国史学者通过史料的运用,在外国史研究领域树立信心。他说“中国人搞外国史,要有点志气,要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有不少人说,中国人研究外国史,材料掌握不如对方多,很难达到高水平;有的人甚至说不如多做点翻译、介绍工作。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材料是研究的基础,当然重要。但我们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进行研究,就能写出高质量的著作。并非掌握的材料要和外国人一样多,才能达到他们的水平。恩格斯写《德国农民战争》,材料主要根据威美尔曼的《伟大农民战争史》,但水平显然高于后者。”^⑪可以说,齐世荣先生以身作则,彰显出一个史学家对于史料的熟练掌握和运用。

二、举重明轻,以具有代表性的实例说明某种史料的运用及其重要性

《史料五讲》在论述回忆录类私人文件中关

①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是齐世荣先生史料学思想的核心所在,此句在齐先生的论著中多次出现。见齐世荣:《史料五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6、218页。

②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36页。

③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35页。

④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215页。

⑤ 齐世荣《齐世荣史学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9页。

⑥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35页。

⑦ 齐世荣《齐世荣史学文集》,第431页。

⑧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200页。

⑨ 齐世荣《齐世荣史学文集》,第394-396页。

⑩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32页。

⑪ 齐世荣《齐世荣史学文集》,第482页。

于涉及政治事件的,举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之例,说明“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认真态度以及陈氏父子在湖南推行新政的积极作为”;举《顾维钧回忆录》之例,说明英美双方在巴黎和会过程中对日本的纵容和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举《杜鲁门回忆录》之例,说明“(美国)投掷原子弹,不是像某些西方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纯粹为了达到减少美军登陆日本本土人员大量伤亡的军事目的,而是另有重要的政治目的”;举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之例,说明二战中“法国人心厌战,宁可苟安一时的心理”。在论及“涉及政治某一方面”的“回忆录类私人文件”时举“贪污黑幕”为例,说明这一丑恶现象的具体情节“从官方文件中很难详细看到或者根本看不到”^①;论及“主要谈个人,旁及所处时代的回忆录”时,举“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蔡元培:《自写年谱》”、“《齐如山回忆录》”、“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钱基博《自我检讨书》(1952年)、“季羨林《留德十年》”、“韦君宜《思痛录》”、“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等数例,说明回忆录可以帮助研究者“重点了解作者个人,连带也了解他的‘所处之世’”^②。作者举上述数例,一方面举重明轻,节省篇幅,说明道理,阐明了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的博识和对各种史料运用的“艺术”。

刘知幾在讲到史书叙事时,认为人们对于材料的运用应做到“略小存大,举重明轻”^③,我们借此语来评论齐先生的大作应当是合适的。

三、通识与辩证思想的体现

在谈及陈垣、陈寅恪纠正朱彝尊关于杨妃入道之年考证之讹误时,齐先生指出“旧日学者具

通识者,大抵得力于朴素的辩证思想。”^④作者强调应把多种史料“互相参照比较,进行分析综合,庶几可以接近历史的真相”^⑤。可以说,用分析综合的眼光辩证地看待史料,这一思想贯穿于《史料五讲》全书。

例如在论述日记的史料价值时,作者写道:“日记确是一种有价值的史料。但使用日记时,还必须参照、对比其他各种史料,分析综合,方可得出比较正确的历史认识,这是无须赘言的。……使用日记这种私人史料时,要注意其诬妄之处,方不致为之所误。”^⑥又如在作者论述了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诸多优长之后,提出了五个方面的“缺陷和局限性”,即“(1)事后追忆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年代久远以后,不可避免地会有错误”;“(2)回忆录总是经过筛选的、残缺不全的”;“(3)回忆录不但是对过去的追忆,也掺杂了现在(即写回忆录时)的看法、思想和感情,既有过去的成分,也有现在的成分,不可认为作者回忆的纯粹是过去发生的事情”;“(4)回忆录有相当强的主观性。回忆录既然是个人性质的,主观性就必然存在。了解这一点,不仅不妨碍我们使用回忆录,反而有助于我们正确地利用回忆录”;“(5)一些回忆录有扬己贬人的缺点”。^⑦尽管作者指出了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但他仍认为不可全盘否定它的史料价值。再如附录中论述写当代史的问题时,分别从“当代人写当代史”和“后代人写前代史”两个方面考察,指出了两种写史方式各自的利弊,并看到前者的特殊困难其实是后者的有利条件,进而指出“两类史著应予并重,不可偏废”,“当代人写当代史与后代人写前代史,都是需要的。二者各有其优越性,也各有其局限性,借用蔡元培先生的话,‘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⑧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始终用分析综合的眼光看待问题,深刻地反映了作者的通识和辩证思想。

①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116-120页。

②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126-146页。

③ 刘知幾《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3页。

④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209页。

⑤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155页。

⑥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82页。

⑦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146-154页。

⑧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196页。

四、材料、文章不可“随意解释”

齐世荣先生作为一位世界史研究学者,以 87 岁高龄暮年撰文,既是从事历史学研究数十年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也是对学术界近年来研究风向和国际学术思潮的一个回应,彰显出他深切的学术关怀。

《史料五讲》一书的撰写动因来源于多方面,首先是作者数十年历史学教学和研究经验的总结和反思。齐世荣先生非常重视历史教育问题,有学者作了这样的评论“他在深入进行史学研究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历史教育工作。他所总结的许多教育经验,对我们今后历史教学的普及与提高,对于人才培养,都有很强的学习和借鉴意义。”^①

《史料五讲》的出版,实际上是齐世荣先生对学界一些史学现象的回应。第一,是对“随意解释材料”的批评,他在上世纪 80 年代,针对所谓“史学危机论”指出“最近一段时期,不少同志认为史学发生了危机,主张研讨新问题,采用新理论和新方法,以获得生机。于是,出现了一批历史新著,还有一些虽不属于史学范畴但其内容是进行历史反思的,也与历史有关。这批著作中有些题

目新颖,立意独特,颇能发人深思,但也有一些随意解释材料,甚至胡乱拼凑史实,用以证明自己的臆说。……总之,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新理论、什么样的新方法,第一步先得把材料搞准确,这是不可省略的打基础的工作。”^②第二,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后现代主义把一切历史认识对象归结为‘文本’(text),说什么‘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德里达语),并认为‘文本’本身并无确定的含义,可以因人而异地做出各种解释,一切解释都是有效的(或无效的)。这种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是根本错误的。”^③齐世荣先生放眼国际学术思潮,指出不能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把一切文本解释为一种虚构,他掷地有声地说道:二战中,德、日、意三国的签降书,“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成没有战败,甚至并无其事”^④。齐世荣先生于 2013 年 5 月写下这篇简短的后记,深刻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时代感和使命感。

正像作者在书中所言“人们常说,看问题、看人要全面。说来容易,做到很难。”^⑤齐世荣先生的《史料五讲》,于通篇见器识,于细处见功力,为我们后学树立了正确对待史料、严肃对待史学工作的榜样。

(责任编辑:仲平)

① 张宏毅《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一位开拓者——齐世荣教授学术成就评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

②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 214—215 页。

③ 齐世荣先生指出,这里不是全面评价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论,其对历史认识相对性的强调,以及揭示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对其研究所起的制约作用,都有一定的道理。见《史料五讲》第 217 页脚注。

④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 218 页。

⑤ 齐世荣《史料五讲》,第 113 页。